

丁 10/10

伊洛学派及其教育思想

程 鹰 著



21231238

教育科学出版社

1231238

《京》新登字第111号

伊洛学派及其教育思想

程 鹰 著

责任编辑 轩辕轲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46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燕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23千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册

ISBN 7-5041-0976-2/G·933 定价：3.30元

结　　言

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兄弟（简称二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二程长期居住洛阳，聚徒讲学，所创学派被称为洛学学派。又因程颐晚年讲学于伊川的伊皋书院，这个学派又被称为伊洛学派。对伊洛学派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伊洛学派及其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合理成分。他们的哲学是研究“人”的哲学。它重视人的理想与道德修养，重视人的教育和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对这些哲学思想的一概否定，就根本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虽然要继承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部分，但它在社会主义这点上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相对立而存在与发展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与各种腐朽的反动的教育思想进行斗争。近几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又要使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我们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的“新启蒙运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等反动观点，也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针锋相对，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要求培养出时代的新人，即具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文化和纪律的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服务的。以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精神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教育，它体现着经济关系的性质，体现着一定阶级的阶级性，为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教育，又有中国的特色，而且还要不断创新，实现教育的进步。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定人们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心，必须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国家的利益，必须重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包括批判继承和发扬伊洛学派所开创的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中经过改造，可资借鉴的优秀道德伦理思想，用以与近年来出现的某些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人际关系冷淡，见利忘义、见死不救、为富不仁、为官不正、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丧失人格、国格等等不道德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如爱国、自强、成仁、取义、仁民、爱物、孝慈、忠恕、诚信、礼让、尚贤、尚俭、尊师、重教、以天下为己任等，进一步弘扬起来。经过二程伊洛学派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是一个丰富的宝藏，至今仍有许多东西尚未发掘出来，需要我们扎实去做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的研究工作，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伊洛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	(1)
第一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1)
第二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政治条件	(2)
第三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	(2)
第二章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	(8)
第一节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的酝酿准备时期	(8)
第二节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时期	(12)
第三节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完成时期	(29)
第三章 伊洛学派教育思想的形成.....	(40)
第一节 对孔子孟子教育思想的继承	(40)
第二节 对韩愈胡瑗张载教育思想的发展.....	(43)
第三节 二程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	(49)
第四章 伊洛学派的学术思想	(51)
第一节 天理论的宇宙观	(51)
第二节 格物致知说的认识论	(55)
第三节 哲学化的伦理观	(57)

第五章	伊洛学派的教育思想	(61)
第一节	程颢程颐的教学活动	(61)
第二节	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	(63)
第三节	论教学思想与原则	(68)
第四节	论道德教育	(74)
第五节	论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76)
第六章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与影响	(85)
第一节	伊洛学派开创了宋明理学	(85)
第二节	清初伊洛学派理学的复兴	(91)
第三节	宋明理学的衰落	(97)
第七章	近现代的伊洛学派研究	(106)
第一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伊洛学派研究	(106)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伊洛学 派研究	(114)
第三节	伊洛学派研究的新时期	(119)
第八章	当代的伊洛学派教育思想研 究	(131)
第一节	伊洛学派教育思想研究的兴起与白 鹿洞书院学术讨论会	(131)
第二节	伊洛学派教育思想研究的发展与岳鹿 书院学术讨论会	(139)
第三节	伊洛学派的教育思想研究与当前的教 学改革	(146)
附：	程颢、程颐与嵩阳书院、伊川书院	(149)
	后记	(169)

第一章 伊洛学派产生的社会历史 条件和思想根源

第一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北宋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比唐，五代有所发展。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工具的改进，出现了成套的铁制犁耙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耕地面积也迅速扩大。手工业方面，在冶铁、纺织、造船、航海等部门出现了新技术。数学，天文学、化学、地质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发明。这就为理学家们进行哲学概括，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上，封建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与土地买卖日趋频繁和严重，出现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集团。他们一方面占有70%以上的土地，且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农民和劳动群众的压迫剥削日益加剧，致使北宋时的阶级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北宋初年，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直接威胁着北宋王朝的统治。从思想上看，这些都说明，当时儒、道、释三教并用已经不能维系人心了。于是，重新编造为北宋王朝巩固其统治所需的理论已成为当务之急。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把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伦理论等相互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精致的哲学体系，以便全面地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等等，作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解释，从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欺骗与麻醉。于是，以“穷理尽性”为核心的标榜

性命义理之学的理学，就应运而生，从而把我国传统的儒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二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政治条件

北宋王朝建立后，有鉴于五代战乱不息，篡叛频仍，纲常破坏，王朝交替的情况，便实行了中央集权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的统治力量，把军权、政权、财权集中于朝廷，集中于皇帝一人，把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二程理学的“理”或“天理”，就是为这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与发展服务的。他们把汉儒提倡的人格化的天帝，改变成为高于一切的“天理”，而皇帝就是“天理”的化身。“忠者天理”，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天理”。反之，就违背了“天理”。这样，他们就把传统儒学的核心纲常伦理，更加理论化了。由于五代时，封建社会伦理纲常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迫切需要重新整顿。但是，传统的儒学，几条简单的关于伦理的规范，空疏粗糙，缺乏说服力，已不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经济情况，难以完成这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因而有必要重新改造传统儒学，使之更富于思辨色彩，为伦理纲常制造一个哲学根据。二程大力提倡从理论上重新阐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企图建立与稳定地主阶级内部的秩序，以巩固北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洛学就是适应了这种政治的历史的要求而创立的。

第三节 伊洛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

从思想根源上看，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传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我国儒家学派，是孔子创立的。孔子提倡“礼”即奴隶制的贵族等级制度的贵

贱、尊卑、亲疏、上下等的严格划分，是为了恢复旧制度的秩序、旧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换句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孔子认为他这样作便可“名正言顺”使天下太平。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仁”的学说，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而仁的标准就是“礼”，按“礼”的规定办事便是“仁”。而为“仁”的根本是孝悌，老百姓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孔子的哲学是“天命论”。他说：

“获罪于天，无所祈也”。意思是天有无比的权威，是世间万事万物，吉凶祸福的主宰者，所以，他提出“畏天命”。孔子做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他删订《诗》、《书》、《易》、《礼》，著《春秋》。这些都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子死后，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孟子名轲，邹人，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人们称他们的学说为思孟学派。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其理论基础，则是他的“性善”论。他又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养心”“寡欲”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孟主张的君臣父子，仁义道德等理论，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到了西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董仲舒创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其哲学是神学目的论。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都是由天的意志所决定的。皇帝受命于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用来论证封建统治制度的永恒性。此后，佛教传入中国，自东汉，经南北

朝、隋唐至五代，佛教盛行，道教也很活跃，出现了儒、道、释并立的局面。儒家的孔孟之道讲说伦理道德，精察人伦；而不善于明庶物，不讲宇宙之生成和万事万物的根源，缺乏包括宇宙观、人性论、伦理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把明庶物（宇宙观）与察人伦（伦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是由二程兄弟完成的。二程把儒家学说论证的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大到了自然界。把儒家有关伦理道德的规定，提高到抽象思维、逻辑推理的高度，从而完成了传统儒家伦理观的哲学化。他们建立了一个思辨性强，理论更加细致，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思想体系——二程理学。从而改造了传统的儒家学说，由儒学进而到理学。

另一方面，二程理学受到了道教与佛教的影响。儒家在与道、释长期同时存在过程中，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彼此也互相吸收作为自己的思想营养，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

北宋时，道教与佛教非常流行。宋太宗大力提倡道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有很长的历史。道教主张修炼养生，超脱尘世，白日飞升，成为神仙。他们把道看作是元气，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他们积累了不少的药物学、原始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把这些科学知识，作为希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幻想的一种手段。他们的修炼主要是修心，而修心则主静，“静则生慧”即不着一物。通过主静的认识论与本体论（道）结合起来。道教的这种“坐忘”、“收心”对于程颢所著的《定性书》产生了很大影响。程颢在《定性书》中要求人们做到内外两忘，就是使人的心灵状态保持平衡。他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这样，二程就把道教宇宙观吸收进来，藉以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即“理”或“天理”，并把这种“理”或“天理”作

为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源。

佛教的华严宗倡“理事无碍”说。华严宗认为佛教的最高精神本体是佛性、真如，这就是“理”。而“事”则是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事”是空幻的，不独立的，只是“理”的体现，依靠“理”才能存在。“理事无碍”就是二者互相通融，并没有矛盾冲突。佛教的这种思想是企图宣扬封建社会无矛盾冲突，是为地主阶级进行辩护的，佛教的这种思想对于二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禅宗提倡的“顿悟”说，认为“佛性”人人都有，如能“见心明性”即可“顿悟”成佛。佛教禅宗的教义，对宋明理学从二程，朱熹、到陆九渊以及王阳明的学说，都产生了影响。二程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中所讲“积习既久，便脱然有觉处”，与禅宗的“顿悟”说，十分相似。

北宋，实行重文政策，发展学校教育。对于哲学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书院始于唐末，到了北宋，则大大发展起来。著名的有四大书院。即嵩阳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其它，如胡瑗讲学的安定书院，孙复讲学的泰山书院，程颐讲学的“伊皋书院”（后名伊川书院）也都很有名。理学家们利用书院宣扬理学。书院是他们讲学的场所，有比较自由讨论的学术风气，师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不同学派之间，都展开相互讨论与批评。例如张载与程颐关于定性问题的讨论；程颐与杨时关于《西铭》思想的讨论、程颐与张横中关于易理、易数问题的讨论等，都是著名的例子。由此可见，书院的产生发展也影响了二程理学。

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道州人。世称濂溪先生，著作有《太极图说》、《通书》四十篇。周敦颐融会《易传》、思孟学派的《中庸》以及道教、佛教

的思想，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哲学范畴。如“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诚”、“仁义礼智信”、“主静”、“鬼神”、“无欲”、“死生”与“中和”等等。其核心思想是关于“性与天道”。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这也对于程颢、程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周敦颐每令二程寻颜回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说也就由此发源。程颢曾说：“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侯师圣从学于程颐，未悟。后访周敦颐，敦颐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程颐再与侯师圣谈论“很为他的见解吃惊，向他说：“非从周茂叔处来耶”。由此可见周敦颐对二程之影响。

与二程创立洛学的同时，张载创立了关学。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因讲学于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是理学关派的创始人。张载二十一岁时，以书谒范仲淹，范仲淹劝其读《中庸》。张载不满足。又读老、释之书，亦无所得，再转而钻研六经。张载讲《易》于京师，听者甚众。张载是二程的表叔，长二程十余岁。一夕，二程至开封，与之论《易》。次日，张载语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随即撤座辍讲。张载讲学，每告人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故其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张载提出了关于“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认为世界万物，整个宇宙即“太虚”都是出自这种物质性的气。他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张载关于“气”的物质性学说，是自魏晋以来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于宋、元、明、清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船山，戴震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载关于人性论“天地之性”（它是湛一纯善的）与“气质之性”（有善恶贤愚差别）的论述，直接

影响了二程的人性论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学说的建立。在认识论方面的“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思想，也被二程所吸收。自张载死后，他的学生大部分转学于二程。因此，洛学的影响便扩大到关中一带。

伊洛学派在当时就是影响较大的学派。河间邢恕称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闻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欵枉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二程集》第332页，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下同）程颢死后，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辨异端，辟邪说，开古今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二程集》第640页）这样，便把程颐推到了孔孟再世的地位，视为孔孟的直接继承人。

第二章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伊洛学派学术思想的酝酿准备时期

程颢、程颐幼年在其父程珦任所庠序读书，并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勤奋学习，强记过人，异于常儿。程母侯氏，好读书史，博古通今，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常在二程读的书线上贴“我惜勤读书儿”，以资鼓励。因此，二程幼年时便养成了好学读书的良好习惯。及长，程颢（十五岁）与弟程颐（十四岁）受业于周敦颐。这时（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周敦颐为南安（今江西大庾县和南康县一带）司理参军，程珦为大理司寺丞知虔州兴国县，假守南安。他见周敦颐气貌非常，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是年冬周敦颐迁彬州彬县令。二程从周敦颐学不足一年。但他们受周敦颐“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二程集》第328页）的熏陶，遂厌科举之习，刻苦钻研六经，立志以恢复圣人之学为己任。程颢、程颐深入研究儒家经典，旁及释、道、诸子百家。学而有得。

程颢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在此后的十几年内，他长期任地方官吏，曾任京兆府鄠县（今陕西户县西北）主簿。这时他在《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中指出：性无动静无内外；天地之性“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性与万物同体，“性顺万物而无情”；君子之性，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常人之性“自私而用智”。定性的方法是内外两忘，两忘则无事，无事则明。这样，他就打破了内与外，主观与客观的界限，把客观归入主观，成为主观唯心主义一

元论。他还提出了“观理见性”的命题。程颐的《定性书》，明显地表露出二程关于人性论的观点，即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并把定性（人性论）与观理（宇宙观）联系起来。全文贯穿了“主静”的认识论，是二程性理学说中一篇重要的文献。在此期间，程颐还写了许多诗篇，以诗论道，文学与哲学相互渗透，是洛学特点之一。通过形象的语言表现出他们的理学观。程颐的《秋日偶成》二首、《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最有代表性。例如《秋日偶成》其二曰：“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通过具体形象地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情态声色，说明格物穷理的基本观点，以悟圣人之道。《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直接表达了他们的理学观点即孔孟之道。如：“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悟世尘。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圣贤事业本经论，肯为巢、由继后尘？三币未回伊尹志，万钟难换子舆贫。”“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他称邵雍贫而乐道，把他化作颜回、孟子，并赞颂儒家人生理想和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赞颂封建士大夫对美好人格和高尚情操的追求。程颐后调江宁府上元县主簿，移泽州晋城县令等。在为地方官吏的十几年里，所到之处，他兴修水利，举办学校，破除迷信、平反冤狱，减轻赋税等，为人民作了大量的好事。在他的住房内常书“视民如伤”四字作为座右铭，并说常愧对此四字，因而受到人们的赞扬。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经御使中丞吕公著推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使里行。这时，神宗赵顼为了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起用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程颐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新政和王安石新学。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

中这样说：“荆公漫行其说，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二程集》第634页）由于神宗未采纳他的意见，且遭到王安石的非难，于是他便恳请外调，遂被改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后又被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程颐以养亲为名罢归洛阳，一年后得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与程颢在洛阳聚徒讲学，宣扬理学。伊洛学派便形成于这个时期。

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十七岁读《论语》已晓文义，读之愈久愈觉意味深长。他说：“《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二程集》第261页）可见，对于儒家经典，他青年时就很有研究，而且相当深入并确有所得。宋仁宗（赵祯）皇祐二年，程颐上书仁宗，以诸葛亮自比，为仁宗皇帝出谋划策，对政治改革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库空民贫，狄强宋弱”，切中时弊。进而指出：“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衣食。而今天下民力匮乏，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岁失望，便须流亡。”“国家财用，常多不足”，“急会诛求，竭民膏血，往往破产亡业，骨肉离散”。社会危机已甚深重。在此“民无储备，官廪复空”，“戎敌强盛，自古无比”的情况下，如果“强敌乘隙于外，奸雄生心于内，则土崩瓦解之势，深可虞也。”由是，程颐主张“行王道”。他劝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二程集》第510—515页）并乞求召对，面陈所学，不报。从此便“闲

游”太学。从《上仁宗皇帝书》中看出，青年时期的程颐，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且有了“正纲纪”、“行王道”、“重民本”的一套儒家的政治主张。十月，二程舅父侯无可应辟南征。程颐作《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曰：“词华奔竟至道离，茫茫学者事驱驰。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志期周礼制区夏，人称孔子生关西。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独尔为。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今朝有客关内至，闻从大幕征南垂。南垂凶寇陷州郡（指侬智高攻陷两广），久张螳臂抗天威。圣皇赫怒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罴。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蕞尔小蛮何足殄，庶几聊吐胸中奇。”侯无可是位儒家学家，故程颐把他比作孔孟。诗中虽然称侯无可“扶持圣教”，“志期周礼”，实际也是说他自己的素愿。嘉祐元年（1056年）程颐二十四岁。随父至京师，入国子监读书。时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阁待讲，仍专管勾国子监。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考试诸生。程颐写了《颜子所好何学论》这篇文章，提出了“学以至圣人”的观点。文章说：“圣人可学而至欤？”曰：“然”。

“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故学必尽其心，尽其心则知其性，反而诚之，圣人也。”他指出颜子所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曰：“不迁怒，不二过。此其好笃学之道也。”程颐批评了那种认为圣人是生而知之，不学而至的错误观点，说：“后人不达，以为圣本生知，非学而至，而为学之道遂失。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则今之学与颜子所好异矣。”（《二程集》第578页）在这篇文章中，程颐提出了“圣人是可学而至”的观点，且带有明显的理学倾向，即心性论，他发挥了